

解读巴以领导人接踵访华幕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伟建

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上旬分别访华，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巴以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期访问同一个国家，实属少见。这样的安排到底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其他考量？中国因素将会对推动巴以和谈产生哪些影响？我们请专家为您分析。



李伟建

问：巴以领导人近期同时在中国访问，这是一种巧合吗？两国领导人来华各自有哪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目的？

答：众所周知，巴以关系长期紧张，而中国与巴以双方却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多名领导人都曾先后到访过中国。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也都不是第一次来华访问，但巴以领导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访华却史无前例。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许多媒体称之为“罕见的访问”。

这当然是中方刻意的安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大使将于4月25日至30日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而在吴大使刚抵巴勒斯坦不久，外交部4月27日和28日就宣布了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分别将于5月5日和5月6日访华的消息，很显然，吴大使此次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对巴以两位领导人的访华事宜做具体安排。

中国安排这对“冤家”领导人同时访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做一做巴以双方的工作，推一推被搁置已久的中东和平进程”，吴思科大使出使前在一次学术会议间隙与笔者谈及他此行的使命时如是说。

安排“冤家”前后脚访华 中国出手积极劝和促谈

说。吴大使表示，新一代领导人对中东问题非常重视，今年我们准备在推动中东和平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他此后在拉姆安拉也表示，今年是《奥斯陆协议》签署20周年，对巴以双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年，也是各方面都寄予希望的一年。中方希望在这一年，使巴勒斯坦问题有所推动，和平谈判能够打破停滞的僵局。同时，中国与其他有关方面也保持着联系，中国会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推动问题解决的一些设想和建议。

阿巴斯访华的目的主要是寻求中国领导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用阿巴斯的话说，政治是此行的首要问题。巴方需要中国继续在中东问题上，包括在重启和平进程方面对巴勒斯坦提供外交支持，希望从中国新领导人那里得到明确承诺。另一个更为实际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帮助巴勒斯坦发展经济。一方面希望中国加大对巴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国利用与以色列的关系，敦促以色列缓解对巴

斯坦经济发展的制约。

而以色列政府通过驻华使馆明确声明：内塔尼亚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耶路撒冷邮报》近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内塔尼亚胡来中国一心想的就是做生意。内塔尼亚胡庞大的随团人员大多由经济、科技和工商界人士构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笔者以为，以色列显然想淡化此行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弱化世界舆论对于中东和谈的关注，避免因巴以领导人接踵访华而让中东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但是以色列方面也深知，这些问题是绕不开的，内塔尼亚胡在完全明白中国用意的情况下依然愿意过来，一是表明以色列对中以双边关系的重视，二来也是意识到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有着潜在的影响力，未来可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内塔尼亚胡此行虽然避谈中东政治，但其“配合”中方的日程安排本身，也可被认为是对中国作用的认可。

无力单边主导中东问题 美国乐见中国发挥作用

问：美国多年斡旋巴以问题未果，美国又如何看待中方的介入？

答：巴以问题错综复杂，任何一个国家认为可以凭一己之力促成问题解决都是异想天开。美国曾经这样想过，平心而论，美国为解决巴以问题确实是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这样的努力并未换来积极成果。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受美以“特殊关系”的制约，美国往往不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秉持阿拉伯人特别看重的“公正立场”，美国常常被批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但有时美国的政策也因为让以色列人感到“委屈”而不被接受。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中东采取收缩政策，战略重心东移已成必然，其单边主导中东问题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能力都在下降。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有更多国家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

因此从总体看，美国对中国有意发挥作用的态度是正面的。《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希望斡旋巴以谈判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美国《国际利益》双月刊撰文也认为，中国更深入参与解决中东问题是一件好事，值得欢迎。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美国媒体引用以色列学者的话说，中国加强在中东的存在是其“抵御甚至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一个迹象”。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中国可以作出姿态，但无法给中东带来和平”文章则认为，中国意外地提出为中东地区担当和平仲裁者，这一提议颇具诱惑力。但是“中国能提供的、让巴以双方都接受的东西还太少”。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及推动和谈的作用，目前尚无法和美欧相比。

笔者认为，上述不同的声音大体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当前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复杂心态：既希望借中国的力量来助其处理国际热点难题，又不希望因此而削弱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力。

但中东问题上，美国并不担心中国的参与会替代美国的作用。美国完全了解，中国既无意愿也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排挤和削弱美国。习近平在会见阿巴斯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一道，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解决继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由此可以期待，未来中美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

问：中方对巴以问题提出四点主张，对此，巴以双方各持什么立场？双方会谈的前景如何？

答：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阿巴斯时提出的四点主张，是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但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予以重申和提炼，使中国的主张和意图更加清晰明了。它将成为中国参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的政策主张总体上是得到巴以双方认可的。但巴以和谈涉及诸多复杂问题，要深入参与斡旋，还需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和方案。

中国此次邀请巴以领导人来访，目的只是表明中国将提升在中东问题上的参与度，并尽自己的努力，为巴以重启和谈创造一种气氛。说到底，巴以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双方自身的努力，要有强烈的和平共处愿望才能构筑起彼此信任的基础。但巴以双方的信任基础恰恰非常薄弱，双方在重返和谈的条件上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国际社会目前要做的是加强与双方的沟通，让双方认识到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同时要致力于消除阻碍谈判的各种障碍，这也是中国下一步的计划。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明确表示，中方首先要为双方恢复谈判创造合适的气氛，让双方谈起来。为此中国要与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为共同持续推进巴以和平不断努力。

中方四点主张获得认可 双方重返和谈前路坎坷

国际社会看重中国「调解」 巴以问题重要性并未降低

问：巴以问题近年来在中东有边缘化的趋势，中国的因素将会对推动这一问题产生哪些影响？

答：这些年来中东地区一直处于激烈的动荡变化之中，但巴以问题却似乎淡出了中东政治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问题久拖不决，巴以和谈谈多谈少，作为主导方的美国又迟迟拿不出办法，以至于关注者出现了“审美疲劳”；另一方面，近两年阿拉伯世界持续发生的动荡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关注。

但是，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对中东政治进程的重要性并未降低，中国正是基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贯立场及对新的形势发展判断，提出要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更积极和更有建设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如某些外媒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中东政策出现了新的调整。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始终支持巴以双方通过和谈解决分歧和争端。在笔者看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阿巴斯时提出的四点主张，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立场。

但为何这次外交行动“罕见地”引起国际社会的热议？笔者认为，这更多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因素的看重。近年来，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热情不断提高，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作用和影响。这也是国际舆论对中国“调解”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对中国因素的重视也反映在中东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上。这些年来，中东国家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认知有了极大的提高，它们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有很高的呼声和期待。尤其是许多国家在经历大变局之后，国家政治和经济亟待治理和重建，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获得中国的经援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需要，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中国因此在中东获得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政治影响力。

笔者认为，现在要说中国对推动巴以问题解决产生了哪些影响或许为时尚早，但逻辑关系已经非常清晰：中东国家对中东因素越重视，对中国在中东的作用就越认可，中国的主张也越会被认真解读和利用，中国发挥作用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

多国宽松演“续集” 中国政策无需变

近期，全球多国央行再次上演联袂宽松大戏，日元大幅贬值是重要的触发因素。专家认为，全球多国央行新一轮联合宽松的刺激性难度及以往，日元贬值对中国整体经济影响不大，中国央行宜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多国降息意在“防御”

继4月初日本央行出台新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后，5月第一周欧洲央行和印度央行相继降息，第二周澳大利亚、波兰、韩国和越南等国央行也加入降息阵营。据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预计，匈牙利、土耳其、以色列和俄罗斯等国央行也将于年内再次启动降息。从全球经济

走势和格局来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央行正步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三轮联合大宽松。

与前两轮主动应对危机不同，第三轮联合大宽松有了更多“防御性”色彩。多国急于降息，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新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各国对于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担忧，担心本币汇率被动升值影响出口。

本轮力度不同以往

然而，第三轮联合大宽松的力度难以与以前两轮相比，更像是第二轮大宽松的“续集”。

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已接近极限，倾向于更多思考其他创新手段来提高政策效力。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渐趋稳固，作为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重要风向标的美联储已开始考虑缩减购债规模，减小刺激政策的力度。国际金融协会预计，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底结束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中期启动首次加息。

此外，在经历第二轮大宽松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已非常有限。例如，澳大利亚央行曾在第二轮宽松期间降

息6次，今年5月再次降息后，基准利率已降至2.75%的历史低点。印度央行在5月初完成今年年内第三次降息后，由于通胀仍然高企，降息周期已接近尾声。

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国际金融协会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郭丰说，中国央行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流动性，而不会追随其他国家降息。

其一，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7%，高于政府定下的

7.5%全年增长目标；与此同时，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经济企稳，物价反弹，意味着货币政策大幅放松的必要性已降低。

其二，日元汇率大幅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一方面，日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不及美元，中国持有的日元资产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过去10年对日出口占中国整体出口的比重大幅下降，日本已降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且两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度并不高。

郭丰指出，在全球央行普遍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市场利率的息差空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新华社记者 高攀 王宗凯